

黄河政治文明基因与 新时代中国治理智慧

◇ 李庚香

中华文明是黄河文明自身蓬勃生长并与其他各类文明竞争碰撞、汇聚交融而曲折发展的结果,在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构建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不仅要坚持中华文明的底色和特色,而且要对蕴含其中的黄河政治文明的优秀政治基因乃至历史性局限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继承或转化,从而增强现代国家治理的智慧,提高黄河文明的价值引领力,提高治理绩效。具体分析,黄河政治文明的现代治理价值和鉴戒主要包括以下十个方面。

一、融会诸子思想智慧,构建更有包容性、有效性、适应性和坚韧性的现代治理哲学

治理是国家的基本职能,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下自觉维护、实现和发展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利益、民众利益的有组织行为。如果没有科学、系统、成熟的理论做指导和支撑,治理就容易偏离正确的轨道,从而导致治理效率低下、损害治理效益,甚至背道而驰,适得其反。治理理论最深刻的思想基础和最高的理论形态是治理哲学,在新时代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开创性地构建现代治理哲学,强化和升华治理理性,为现代治理奠定深厚的理论根基和提供具有超越性、引领性的思想指导。构建新时代国家治理哲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前提下,在开放性地借鉴吸收世界哲学发展成就的过程中,必须浚源聚流,从黄河政治文明中汲取历史资源并赋予其时代精神,发挥其现代治理效能,实现其价值引领力的作用。

一是将诸子思想的历时态应用转化为共时态应用,增强治理哲学的丰富性和有效性。诸子思想诞

生于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不仅代表了当时人们对于自然、社会、政治、经济、伦理、外交乃至人自身等方面认识的最高水平,而且许多认识都具有终极性的价值或者说对许多终极性的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对于今天思考和分析这些问题仍然富于启发意义,是黄河政治文明的主要载体和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包含着中华文明几乎全部的密码。古代曾有学者提出“文不读三代以下”,这种观点尽管有偏颇之处,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先秦诸子之学的重要地位和价值。诸子之学包括先秦时期的道家、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兵家以及杨朱、告子等学说,可谓宏论震古烁今、文采各有千秋、治国各有其用。这些学说既见仁见智、独树一帜,又相互辩难争鸣和借鉴吸收,并且都对国家治理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和方案,对当时及其后的国家建构和社会治理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客观地分析诸子思想,各有其睿智之见,也各有其偏颇之处,如同盲人摸象,各得其一,又各得其宜。春秋战国时期,既是百家争鸣、诸子思想形成的时期,也是诸子及其门徒周游列国、传播和实践自己思想的时期。由于诸子思想彼此攻讦、势同水火,在当时没有形成多元一体的思想体系,因而当他们被不同的诸侯国在某种程度上采纳并付诸治理实践的时候,往往也是彼此排斥的。也就是说,诸子思想在治理实践上的应用是历时态的,而不是共时态的。由于各家学说理论上的缺陷,在实践上应用的时候,其优势得到彰显的同时,其劣势也不可避免地被放大,在达到某一方面治理目标的同时又造成了严重的乃至灾难性的后

果。比如,战国时的秦国从秦孝公时期就开始奉行法家思想,先后任用商鞅、李斯等变法图强,对内以法、术、势结合强化治理,对外以耕战为依托进行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国家迅速富强并吞并了六国,建立了强大的秦朝。但是,秦始皇在建立大一统的国家后,在国家治理上继续采用单一的法家思想,甚至采取焚书坑儒的极端措施,排斥打击其他各派思想。由于治理思想的极端贫乏和脆弱,最终导致强大的秦朝仅仅维持了十几年后便迅速灭亡,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其后建立的汉朝,尽管汉承秦制,几乎摹刻了秦朝的基本政治制度,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秦朝单一采用法家思想治理国家的刻薄寡恩的治理模式,综合采用了法家、儒家、道家以及黄老之学的治理思想,极大地增强了治理的有效性和适应性,不仅经济社会得到很快的恢复与发展,而且维持了两汉长达数百年的统治。保持治理思想尤其是治理哲学的兼容并包,实现诸子思想由历时态到共时态的实践应用,是一个成功的治理经验。

二是重视现代治理哲学形而下的问题导向与形而上的超越性导向的均衡,增强治理哲学的适应性和坚韧性。毫无疑问,治理应该直面社会问题,坚持问题导向,着眼于化解社会矛盾、缓和社会冲突、革除社会积弊。但是,如果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仅仅限于社会问题本身,仅仅做了形而下层面的思考,缺少对问题更深刻根源的探析、对更本质问题的把握,就容易思路狭隘、认识肤浅、对策无效,就容易完全被问题左右而疲于应付。所谓形而上问题,概指超现实的问题,是现实问题背后乃至之外的问题,是人的认识、本性最终可能触及和不可回避的问题,甚至可能是所谓很荒唐、很无聊的问题,却是时常显现的问题,譬如信仰、意义、鬼神、祭祀、命运等。对于具有彻底革命精神和唯物主义立场的我们来说,这些形而上问题是需要彻底批判和抛弃的。但是,从历史、现实、文化、习俗和国际视野来看,这些形而上问题和思维具有很大程度的普遍性,又是现代治理必须面对的问题乃至难题,如果不给予足够的重视、不加以深刻的研究,那么就很有可能在治理思想和对策上留下漏洞,造成治理盲区。总体而言,我国

古代诸子思想对于形而下问题的探索弱于对形而上问题的探索,但主要致力于治国理政的儒家、法家思想在充满问题意识的同时,对于形而上问题的探究比较淡化,甚至着意回避对于形而上问题的思辨。比如,《论语·述而》篇载:“子不语怪力乱神。”法家思想往往立足于赤裸裸的“人性恶”的假设,认识犀利、举措强横,在治理上尽管简明快捷、立竿见影,但由于缺少人情的温度和终极意义的关怀,往往得不偿失、满盘皆输。因此,借鉴诸子思想构建现代治理哲学,既要重视其关于形而下问题的思想成果,也要重视吸收和研究其关于形而上问题的思考探索,不能把其关于形而上问题的思想仅仅当成思想糟粕简单抛弃,而要认识到其历史价值、文化习俗意义和社会现实心理需求,避免或减少现代治理举措中的抵牾,增强治理体系的适应性和坚韧性。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我们国家逐渐确立了多种形式的公祭仪式,并将多个传统节日作为法定节日,不仅强化了民族文化遗产和国家认同、增强了民族凝聚力,而且促进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丰富了国家治理工具,促进了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而从一个相反的例子来讲,某地为了移风易俗、保护耕地,强力推进平坟运动,不仅造成当地群众的强力抵制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影响了社会稳定,而且最后也没能坚持下来,造成了治理上的失败。这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说明,构建现代治理哲学,要注重对于诸子思想的综合运用和扬弃,尤其是注意对其形而上思想的分析、吸纳和当代转化,尽量避免采取非黑即白、顾此失彼的态度,以致造成治理思想的片面性。

三是重视对黄河政治文明天人观和人性思想的现代转化,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背景下复杂的社会治理提供更加多元的治理智慧。由于历史条件和科学认知水平的局限,诸子思想几无例外地都把天作为最高的哲学本体,以天为则。天代表最高的善、最合理的秩序、最公正的权威,凡是有利于人的生存繁衍和国家有效治理的行为都是天所褒奖和庇佑的,凡是损害人民生存、戕害人的善良本性的行为与暴政都会受到天最严厉的惩罚。天道衍生人道,人意必须遵从天意,不可逆天行事。天人合一,

一方面,天的意志往往要通过圣王和圣人的意志来表达,国家君主和贤能之士代表着天意来进行治理和教化,人民应该诚心服从;另一方面,天又通过民众的反映来考察国家的君主和治理者,根据民心民意奖善罚恶,决定是否继续保持其统治地位和享有的禄命。也有一些思想家认为天人相分,天无善恶和好坏,人行善则得福报,人行恶则得恶报,人的行为及结果皆由自取,因而要趋善避恶。诸子的天人思想在今天看来非常粗糙甚至鄙陋,但其影响却极其深远并绵延至今。历史地看,这种天人观也有其重要的认识价值和道义价值,因为天人合德是对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规律朴素认识的体现,是对真理制高点和价值制高点的初步探索,不可简单地因其带有迷信色彩(如“天人感应”)而加以抛弃。在构建现代治理哲学的过程中,对于诸子的天人思想要做到几个区分,即科学与哲学的区分、真理与道德的区分、政治与文化的区分、制度与习俗的区分,更加重视其哲学意义、道德意义、文化意义、习俗意义,将现代复杂性治理中的天理、国法、人情等因素融为一体,革除现代治理中纯粹技术理性、工具思维的弊病。此外,诸子思想对人性做了种种探索和解析,如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恶论、趋利避害论等。尽管马克思主义否定抽象的人性论,但进行国家治理必须立足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对人的行为动机进行深刻的探索和尽可能全面的把握,始终做到以人为本。因为国家治理的主要对象是人和人组成的社会群体,缺少对人和人的群体特性的基本认识与把握,各种治理举措就有可能无的放矢、不得要领。在现代治理实践中,要重视治理哲学教化性与辩驳性的统一,保持治理哲学的发展活力。而诸子思想关于人性的各种假设与探索,对于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在发展中改善和保障民生,更加有效地应对社会阶层分化、思想多元、需求多样、价值多维等挑战,不断推进治理的科学化、现代化、规范化、精准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重视对黄河政治文明终极价值的返璞与反哺,推进民本思想与民主法治思想的有机融合

国家治理的根本问题是国与民、政与民、官与民

的关系问题,如何看待、确立民的地位和价值决定了治理理论的先进与否、合法与否、有效与否。黄河政治文明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揭示了国家治理的终极价值,成为我国历代政治进步和治理水平提升的内在动力和价值标杆。这种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体力量的观点具有天然的契合性,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初心和使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在发展中改善和保障民生等思想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这种民本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揭示了民众对于国家及其统治者的重要地位,指出国、君、官、民既相依相生、相辅相成,又彼此存在矛盾和利益冲突,民众很可敬、民众很可悯、民众很可畏,需要不断廓清利益关系、界定权责界限、化解矛盾冲突;指出立国之本在得民心、强国之本在得民力、治国之本在安民心,爱民是最大的仁政,是最高的天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亡天下。同时,对于为政如何养民、富民,为官如何爱民、安民,如何在注重民生、蓄积民产的基础上加强教化、培育善良风俗等,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和可资借鉴的操作方法。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一方面,应该对民本思想的终极价值观返璞归真,深刻总结其历史价值、充分发掘和转化其现代应用价值,自觉进行继承、发扬、运用,充分体现黄河文明优良政治基因的一脉相承性,增强现代治理方式的可接受性和有效性,真正彰显现代治理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另一方面,民本思想毕竟是在古代国家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朴素的治理价值观,尽管具有真理性、道义性的终极性认识,但也具有许多历史局限。在强调返璞归真、继承扬弃的同时,更要立足于新时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科技发展实际以及时代潮流对这种政治价值观进行反哺,赋予传统民本思想新的生命力,并不断完善其保障机制,让民本思想的价值在新时代得到切实的实现,确保现代国家治理始终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

一是以民主保障民本,增强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性。传统的民本思想尽管高度重视人民对于

国家兴衰存亡的重要性,但同时又仅仅把人民当作治理的对象,极端地压制人民的政治权利,排斥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所谓民本往往流于一种政治笼络的宣示和道义操弄,人民只能作为一种被驯服的工具存在,民本的价值追求常常被现实的暴政碾压和摧毁。在现代国家治理中,要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的原则,不断完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机制,丰富民主形式,创新民主载体,扎实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充分发挥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性、积极性、创造性。

二是以法治保障民本,防范人民权益可能受到的各种侵害。传统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人民的权益缺少法治保障,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随时面临被践踏和剥夺的悲惨命运。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实现民本思想的终极价值,必须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必须积极认真地实施《民法典》,努力构筑保障人民正当权益的法治防线。在立法方面,优化立法的体制机制,遏制立法中的部门利益,提高立法质量,让立法真正能够反映党和人民的意志,形成科学的、高质量的法律规范。在执法方面,重点解决执法不作为、乱作为,不依法履职尽责、滥用职权、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在司法方面,强调公正司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正义公平,防止不当干预、滥用司法权力,尤其要防止暗箱操作、司法不公,坚决纠正冤假错案。在全民守法方面,致力于各个层级的普法活动和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抓住“关键少数”,让领导干部成为尊法守法、学法用法的模范,将法治观念和制度意识强不强作为衡量干部德才的重要标准,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从内心深处信仰法治、认同法治,将民本的价值追求升华为领导干部的法律信仰,以法律手段促进形成良好的干群关系,使法治方式成为保持党和人民血肉联系的坚韧纽带。

三是以完善的民生政策来保障民本思想落地,实现民本思想的生活化。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民生,民生是治理的基础和检验治理成效的主体标准,

民生状况取决于民生政策的合理性和完善性。黄河政治文明的民本思想大多来自于思想家的理论构想和道义追求,至多是源于缺少相应职权的臣属对于君主的劝谏之言,其思想尽管很深刻,富有治理的价值和智慧,但往往难以形成具体有效的民生政策。在现代治理中传承黄河政治文明的民本思想,一个至关重要的着力点就是要将其思想意蕴和价值转化为民生政策。要坚决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改革和发展中不断改善民生的总体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经济效益,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激发经济发展和创新活力,提高劳动收入在社会财富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并不断创新完善民生政策,加强科学合理的二次分配政策设计,大力发展社会慈善事业,让人民群众共创、共建、共治、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享有更有力的社会保障、更优质的教育、更高水平的就业、更放心的医疗服务、更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通过创新完善经济和社会发展体制机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以持续健康的发展保障民本,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充分展现中国治理的制度优势和治理绩效。

三、更加重视大一统国家观的现代传承,厚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根基

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前提和最强烈的民族情感,是社会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和社会团结的最强韧联结纽带。黄河政治文明的显著特征和优势正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且与时俱进的大一统国家观,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蓄积了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这种大一统的国家观内在地包含道统、正统、治统三个方面,我们在新时代必须自觉地加以传承和发扬光大。

一是扬弃儒家的道统观,培植和滋养国家统一的文化根脉。孟子最早提出儒家道统传承的脉络关系,而真正冠之以“道统”这个概念的是朱熹,他提出:“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

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孟子之后,颜氏、曾氏、子思一脉相承,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相继,而朱熹又继周、程而续其道统。尽管儒家道统说中的认识多显狭隘鄙陋,历来对其也颇多异议,但用历史的视野来看,道统思想充分反映了黄河政治文明乃至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特质,彰显了文化自信和以天下为己任、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不仅在历史上发挥过抵御侵略、维护国家民众安全、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社会伦理和生活秩序等积极作用,而且在全球化日益复杂、逆全球化涨潮、更加伟大的全球化加速酝酿的新时代,对于增强中国人民和全球华人华侨的向心力、凝聚力进而促进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时代弘扬道统说应摒弃儒家的门派之见,摆脱其维护落后的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立场,重点清除其专制思想和官本位文化,剔除其陈腐理念和思想糟粕,吐故纳新,赋予其黄河政治文明乃至中华文明载体的意义,在全民族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感,塑造和强化民族性格、文化印记,编织中国人民和全球华人华侨的同心结、连心桥,共同促进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是树立辩证、开放的黄河政治文明正统观,历史地认识中体西用的文化价值,以文化自信与文化兼容促进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黄河政治文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尊、自信、自强的正统气质,这种正统气质保持了黄河政治文明在与其他地域文明碰撞、竞争、融合中的主体性地位,展示了中华文明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包容力,促进了古代中国疆域的扩展和国家的统一。但是,这种主要以儒家文化为基调的正统观也具有其内生的封闭性、狭隘性,随着专制统治体系的成熟,其落后性与弊端也不断显现,最终导致中华帝国和中华文明的衰落,也导致人们对于中华文明历史和现实价值的质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立足于中华文明包括黄河政治文明根基的千秋伟业,不能割断文明之源、文化之脉,中国特色必然地包含中华文

明的本色、底色,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功和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源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其中就必然地包含与中华文化的有机结合。因此,无论现代化如何推进、现代治理如何提升,都必须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不忘本来、吸收外来、走向未来,否则,我们的现代化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中楼阁,无法持久推进、持续成长。树立辩证、开放的黄河政治文明的正统观,我国在古代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由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仍有其历史价值。毫无疑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新时代分两步走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程,仍然无法超越中西方文明的相互竞争、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过程,如何认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是一个长期的命题。中体西用思想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等发挥过积极作用。尽管中体西用思想后期成为清朝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而且作为一种文化整合方案和教育宗旨,它又是粗糙的、简陋的,仅仅出于一厢情愿和良好愿望直接嫁接,没有克服中西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但不能因为这种思想主导的洋务运动没有完成救亡图存的使命就完全否认其历史价值甚至将其一弃了之。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在应对西方文化前所未有的冲击、渗透、分化的严峻挑战下,重新认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并站在新时代的高度赋予其“马魂中体西用”的全新内涵,既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又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同时为人类社会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不断丰富现代复杂性条件下的治理思想和治理工具,不断提升治理水平与治理成效,是符合文化发展逻辑、现代化发展轨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

三是从黄河政治文明的治统中汲取现代治理智慧,全面提升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领导力。所谓治统,概言之就是以道统为引领、以正统为宣示的国家统一和有效治理的体制机制及其实践过程,是大

一统国家观的具体体现和直接载体。要而言之,治统就是统一。从黄河政治文明的起源开始,也即黄帝时代开始,统一就是天然的基因和强烈的内在追求。追求统一、维护统一、拥护统一,是黄河政治文明的核心密码,是今天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发扬光大的政治传统。从历史的进程分析,黄河政治文明的治统有三条重要的启示。其一,统一是人心所向,是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基本前提和保证。自从人类进化到阶级社会,就再也不可能回归到小国寡民的状态。从国家的发展利益和民众的生存利益需求来看,统一能够最大限度地集聚发展资源,防止战乱的破坏,促进文化繁荣、文明进步,有利于完善国家治理、保障民众安居乐业,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最为一致的利益需求和价值追求。分裂不得人心,分裂是千秋大罪,这是历史的结论和人民的共同抉择,也是新时代推动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其二,实现统一必须文武并用,呼唤具有伟大抱负和卓越能力的领导者。统一尽管是人心所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但不是自动实现的,是由英雄人物和人民群众共同来推动的,其实现的进程既需要依靠武力,也需要依靠有效的治理,正所谓“马上打天下”和“马下治天下”,需要超世的文治武功。黄河政治文明所造就的丰富、系统、深刻、独到的国家统一和治理的原则、智慧、艺术、经验等都是今天实现国家统一和有效治理的有益资源。其三,维护统一必须创新治理的体制机制,处理好国与民、内政与外交、守成与创新、统治集团内部势力分化与自我进化等核心关系。国家治理面对的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创业难,守业更难,这是历史的深刻经验。为了以有效的治理实现统一、维护统一,既需要领导者主观上的励精图治,也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科学、务实、富有成效的治理体制机制。在这方面,黄河政治文明创造的分封制、郡县制、羁縻制、朝贡制、混合制以及以上几种体制机制所蕴含的德治思想、法治思想、道治思想(以黄老思想为代表)、自治思想、王霸融合运用思想、合纵连横思想等,对于新时代有效应对国际竞争与合作交织、祖国统一大势所趋与分裂倾向依

然存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与阶层分化的张力加大、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与党群干群关系还不够协调等问题,都能够从正面提供经验、从反面提供鉴戒。总之,建党百年的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自成立以来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是中国大一统的继承者、维护者和发扬者,黄河政治文明所开创的大一统思想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时代的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迈进的宝贵思想财富和丰厚政治资源。

四、更加自觉地继承、转化、创新集中统一领导的文化、体制优势,增强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不断将治理体系的优势转化为强大的治理效能

黄河文明是从分流域到全流域、跨流域发展的总体性文明,具有鲜明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先天政治基因。从历史传说中黄帝融合炎黄部落、战胜蚩尤的九黎部落,到大禹领导治水、继承部落首领之位,由于领导区域广大、需要组织实施浩大的治水等民生工程,集中统一领导成为最有效率的领导方式和治理形式而被选择和不断强化,其后不断发展完善成为丰富、系统、深刻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机制、文化和经验智慧。集中统一领导方式因巨大的能量、集中的资源、深远的谋划、高效的决策、共同的意志、协同的行动而容易激发出超常的动能和效率,从而造就了中华一统的文化和国家规模,形成了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冠绝一时的世界大帝国和辉煌的中华文明,证明了这种领导方式和治理形式内在的有效性与优越性。但是,由于这种领导方式和治理方式直接源于君主专制统治的历史以及其自身所带有的消极因素,尤其是19世纪40年代中华帝国在抗击西方新兴的资本主义列强的斗争中遭遇失败,从而使其成为一种落后的、残暴的统治形式的象征而被污名化,特别是在西方学术话语和政治实践上通常将其作为被批判、警惕、防范的对象,使得其中蕴含

的有益的领导和治理价值被长期忽视甚至掩蔽。根据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所揭示的自然进化、社会发展、认识提高的辩证逻辑,一切历史上人类认识的成果、创造的成果、实践的成就都会在现在和未来复苏,对我们的现实和未来有形或无形地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或者说这些因素根本就没有从人类的精神、血液和社会实践中消失。当然,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因素的现实显现也不会是它们原来的那个样子。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道路来看,我们党深刻吸取了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尤其是“文革”时期权力过于集中、个人崇拜严重等导致的民主法治被破坏、经济发展受抑制、社会活力不足的教训,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形成和完善了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制度体系,短短40余年间,我国从一个比较贫穷的发展中大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社会保障不断完善、社会稳定有序、国际地位大幅提高,不仅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而且独具特色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也得到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空前重视。从国际视野来看,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突破君主专制束缚的结果,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想意识和制度也都对集中的权力保持高度的警惕与排斥。但是,当世界资本主义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了长达数百年令人陶醉的发展后,尤其是经历20世纪80年代全球金融危机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显现出不可遏止的衰败趋向,政党恶斗、两党极化、政府低效、经济疲软、阶层固化、社会撕裂、精神颓废、价值观迷乱等成为其挥之不去的噩梦,过去被认为是人类“历史的终结”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陷入其自身发展逻辑所导致的泥淖而不能自拔,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和社会公众对其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小政府、大市场”“弱政府、强社会”的治理模式进行反思,开始呼唤更加强有力的国家领导、更有集中统

治能力的国家制度、更加有效进行宏观调控的市场机制,开始关注、认同集中统一领导和治理方式的价值及优势。

根据以上分析,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治理方式是黄河政治文明的重要特质,在现代国家治理中仍然值得借鉴和发扬光大,但不是简单回归和复原,而是必须与时俱进地赋予其新基础、新内涵、新生命、新价值。

一是集中统一领导必须与崇高的信仰相结合,坚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念。集中统一必然地会产生集中的权力,越是集中的权力越需要保持正确的行动方向和目标,否则就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导致权力误用、滥用、腐败和无可挽回的损失。在新时代,在充分发挥我们党集中统一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的时候,必须把保障权力运行的正确方向放在首要的位置,把牢记和践行党的初心使命作为重中之重,并予以制度化、法治化。

二是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确保形成信念坚定、品德高尚、能力卓越、深孚众望、人民拥护的领导核心与领导集体。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其优势和积极作用的前提是权力掌控者具备高超的素质、能力和正确的价值观,由于客观上存在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规律,因此,建立坚强的领导核心是发挥集中统一领导制度优势的必然要求和关键保障。从黄河政治文明的发展轨迹看,政以人兴,有斯人乃有其政,有其政乃有其功,有其功乃有其国,古代的盛世莫不是由那些具有“修齐治平”理想和雄才大略的明君贤相开创的。过去在学术研究上为反思传统政治的弊端,常常简单地把“为政在人”作为人治来进行批判,事实上也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无论何种政体,领导核心的作用都至关重要,但集中统一领导体制对于领导核心具有更加高标准的要求。所谓集中统一,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权力的集中统一。如果权力的掌控者缺少应有的品德、才略、威望和强烈的权力为善、建功立业的追求,必然造成“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的悲剧,害国、害政、害民、害己。辩证认识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深刻吸取历史

的经验教训,在新时代进一步继承、完善、创新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精髓,在中央层面要按照马克思主义领袖理论和党的领导集体建设经验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核心建设,在地方层面要按照党中央关于领导班子建设的要求,确保把那些政治坚定、本领高强、政绩突出、清正廉洁、敢于担当、作风优良、群众拥护的优秀干部选配进各级领导班子,完善党的组织体系,树立“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将集中统一的权力与功能强大的领导集体有机结合,防止政治人物平庸化、政策制定错乱化、决策执行低效化、治理绩效负面化。

三是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立足于不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实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科学化、制度化、法规化、机制化,必须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机结合、同步推进,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对黄河政治文明中集中统一领导优良政治基因的现代传承必须立足于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发展的基础,重新架构国家与人民、治理者与民众的关系,将传统的集中统一领导方式从人治基础转换到法治基础上来,以民主来保障良法善治,以法治来保障人民当家做主。要坚决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与尊严,坚持党领导人民立法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行动,将传统政治的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深谋远虑、灵活应变、当机立断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于法有据、公开透明等现代政治运作规则有机融合,既保障权力运行的高效,又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确保权力规范有效运行。要有效制约和淡化权力行使的个人色彩,切实体现权力的人民属性、组织属性,最大限度地发挥权力作为治理工具的积极的善,最大限度地抑制权力可能造成的危害公共利益的恶。要将黄河政治文明中“主道治近不治远,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治理智慧进行创新性发展,在积极发挥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集中统一领导优势的同时,注意调动社会公众、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积极性,有机融合政治、法治、德治、自治等各种治理形式的适用特质和优势,共同应对日趋复杂多变的现代治理问题。

四是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增强科学思维和技术思维,善于借助智能技术提升国家领导力。传统的集中统一领导思想偏重于领导者的个人洞察力和谋划力,带有鲜明的经验性色彩,这在过去决策变量相对较少、社会变动趋势比较缓慢的情境下还是可以的。但是,面对当今发展趋势复杂多变,国际与国内局势紧密相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非传统安全等因素纷繁交织的时代背景,任何个人的智能和经验都难以准确地把握复杂的决策变量,超前地研判治理风险,及时有效地制定和实施周密适用的治理措施。因此,在现代治理中,要高度认识科学技术手段的战略价值和政治价值,增强智库思维,善于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增进领导者的观察能力、预判能力、决策能力、执行能力、沟通能力和协调能力。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集中统一领导方式和治理方式虽然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和独特价值,但不是唯一适用的领导方式和治理方式。现代社会治理如同治疗疑难杂症,往往没有单一的特效药、万灵药,而应该借鉴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面对不同的领导环境和社会问题,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在遵循自身发展逻辑的同时,必须增强全球视野,注意借鉴吸收人类文明创造的所有有益的制度成果,丰富领导模式、创新治理工具、提高治理成效。

五、发扬光大贤良政治的优良传统,建设符合现代治理趋势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黄河政治文明中的选贤任能思想尽管是一种理想化的国家治理主体培育和选拔思想,其思想光辉在长达数千年中为皇权专制的铁幕所笼罩,但正如愈是在暗夜明星的光亮愈加耀眼一样,这种思想照亮了我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崎岖路途,给我国古代政治带来了向前向善的动力,为历朝历代都造就了一批批以天下为己任、为苍生谋太平的仁人志士和明君贤臣。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选贤任能思想的继承发扬者,坚定地确立了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坚持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并在新时代进一步提出和完善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实施了建设政治过硬、

本领高强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的策略,从而保证了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和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伟大的成就。面对中国惊人的发展成就,对比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所呈现的发展颓势,2016年加拿大籍全球著名政治学者贝淡宁推出了中文版著作《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引起了世界性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贝淡宁认为,中国选贤任能的政治尚贤制历史悠久,是主导和推进中国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及社会变革的关键因素,更加适应面临复杂政治、经济、社会、生态问题的发展中大国。从民意调查看,贤能政治模式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长久以来,学界、政界和舆论界一直以西方民主制的视角研判中国的政治制度,认为只有以一人一票为基础的选举制度才是好的,其他一切政治体制都是专制统治。然而,在当前诸多实行选举制的国家中,资本集团掌控着不成比例的权力,美国的大选甚至被称为“一美元一票”,而非一人一票。贝淡宁认为,中国的政治尚贤制不仅能选拔出能力超群的领导者,而且以此种方式选拔出的领导者更具长远眼光和全局意识,能够做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政治决断,有利于规避民主选举制的主要缺陷。用政治尚贤制的理想来比照中国的现实,贝淡宁认为中国要真正实现在道德上可取、政治上稳定的尚贤制度,还要进行长期的探索和完善,只有真正做到“上层尚贤、中间实验和基层民主”,中国模式的贤能政治才能成为21世纪备受全球瞩目的政治发展模式。贝淡宁的观点在引起强烈共鸣的同时,也引起了广泛的质疑。如今,民主价值已经成为共识,主权在民的基本理念业已融入现代民主国家的政体架构之中,并深嵌于政治制度运转过程,对于贤能政治理念的倡导及其运作模式都必然地会引起许多人关于专制、人治、特权、现实性等问题的警惕性思考。即使是贤能政治的倡导者,在为尚贤制辩护的同时也清楚地指出了其面临的潜在的挑战,如官员腐败问题、制度僵化问题和统治正当性问题等。此外,从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关系角度看,贤能政治容易导致封闭式精英集团的产生,无法满足社会成员的道德期待;

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角度看,贤能政治忽视责任机制的建构,难以发挥应有的社会回应性;从中国经验与世界趋势之间关系的角度看,贤能政治与民主制度建设的宗旨不一致,不利于塑造政治文明的国家形象。置身于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原则,为了切实提升国家现代治理水平和成效,应该突破贤能制与选任制二元对立的偏颇立场,深入探寻二者之间的融合理路,着力实现贤能委任制与民主选任制的功能互补与制度耦合,从而对我国黄河政治文明的选贤任能思想不断地加以充实、转化、创新、完善。

一是要将黄河政治文明选贤任能思想的超越性价值追求现实化,最大限度地形成、制定便于操作和把握的用人标准。传统的贤能思想注重信仰、道义、操守、自律、自修,强调率先垂范、舍生取义、心性修养、济世救民,主要体现于精神层面、心理层面和自我层面,与政治层面、制度层面、社会层面缺少衔接,存在当权者与在野者、思想家与政治家、国家需求与不同统治集团之间巨大的分歧与矛盾,难以转化为事实用人标准,甚至与事实用人标准大相径庭。而且这种贤能思想的具体内涵比较模糊,贤与能的标准常常重叠,容易出现以贤代能或以能代贤的问题,在用人实践上经常出现任人唯贤与唯才是举的矛盾,扰乱了选人用人的标准与思维,既不利于人才的选拔,也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自我塑造。在新时代培养、选拔国家治理人才的实践中,既要高度重视和继承发扬传统贤能思想的超越性精神与价值,重视人才的品德修养、气节操守、爱国爱民情怀、自修慎独风范、担当奉献精神,又要善于结合现实的领导和社会治理实践,对党组织的要求、履行职责的条件、工作实绩和表现、社会和群众的需求、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特殊能力等因素加以综合平衡,并根据不同的领导层级和工作岗位确定比较具体的贤能标准,为提升现代治理成效选拔最为适用的领导人才。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既要重视品德,也要重视才干。

二是创新贤能认定和选拔的民主制度与机制,

最大限度地将组织意图与民意有机结合,减少冲突因素,寻求最大公约数。贤能标准具有多种歧义和高度的复杂性,容易受评价者自身立场和认识角度的制约,常常见仁见智甚至截然相反。但无论评价维度多么多元,最终标准都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只有从根本上体现民意,才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黄河政治文明的选贤任能思想最大的历史局限在于没有实现制度化,只有尊贤的思想和追求,没有贤能者得到客观、公正、顺利使用的必然保障机制,而且任贤的主体是君主和上层当政者,贤能的评价结果以及是否能够得到使用主要取决于当政者、当权者的个人意志。尽管选贤任能强调任人唯贤,主张“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用人佳话,而不是用人的常态,历史上现实的用人状况基本上是任人唯亲、任人唯顺、任人唯私。在新时代,我们发扬光大黄河政治文明的贤能思想,不仅具有强烈的价值追求,而且有条件超越过去历史条件下的各种政治私利和纷争,通过创新和完善制度机制,使选贤任能制度化、机制化。党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是天下为公的笃实践行者,党的领导和党管干部原则突破了任人唯亲、任人唯私的政治制约,能够真正着眼于不断提升现代治理水平、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崇高目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将党组织的用人意图与人民意愿以及民主思想、民主精神、民主制度、民主程序等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培育、推荐、选拔干部中的把关作用,设置一系列规范选人用人的制度安排,营造公平竞争、有利于贤能者脱颖而出的良好政治生态和用人环境,避免压制和埋没人才的行为,坚决防止用人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提高党组织培养推荐与民主选贤的规范化与制度化水平,不断加强和完善公开公正选贤任能的制度和机制保障。

三是健全权力制衡和法治化运行规则,确保贤能者最大限度地在现代治理中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同时有效防止贤能者掌权后的腐化、蜕化,避免贤能政治蜕变为人治和专制。黄河政治文明的选贤任能思想单方面强调贤能者的价值,存在贤能者完美、贤

能者万能、贤能者无失的贤能崇拜倾向,主张“劳于求贤,逸于任贤”,见贤必用、任贤不疑,对于贤能者掌握权力后可能存在的滥用权力、谋取私利、腐化蜕变等问题没有做深入的思考和提出防范建议,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人治色彩,缺少科学配置权力、合理制衡权力、有效监督权力的制度与法治思维。在今天继承弘扬黄河政治文明贤能思想的同时,要将贤能政治从人治和专制的泥淖中拉出来,重新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深厚土壤,一方面保障贤能者当权当政,另一方面确保贤能者执掌的公共权力在法律制度的框架下运行,探求贤能制与现代法治的有机融合,既充分发挥贤能者权力向善的力量,又以完善的法治为依托构建预防贤能者权力变异的坚固防线。同时,要加强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锤炼与作风建设,消除特权思想,增强法治意识和平等观念,坚决摒弃“家长制”作风和“一言堂”做派,为贤能政治构建激浊扬清的良好政治生态。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方向既不决定于西方世界的流行模式,也不会被传统的文化理念、治国经验所完全限定。政治制度的优势最终决定于针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能力,以及面对未来变化的自我完善能力。选贤任能是中国政治的优良传统,作为精英选拔机制,它可以和各种政治制度相结合,在崇尚权利平等的民主和法治社会更有可能发扬光大。政治发展的目标不是将民主机制嵌入贤能政治,而是将贤能机制嵌入民主政治,通过法治化的制度建设,广泛而公正地遴选社会精英,并让精英的贤能服务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六、辩证认识重本抑末思想的现实价值,超越经济发展本末思想的争论,增强长时段复杂不利环境中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成长性

黄河政治文明中的重农抑商或重本抑末思想是有关国家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系统思想,比较早地将国家经济形态和产业政策主动地与国家的安全、发展与军事扩张战略有机地匹配起来,比较集中地在秦国得以实践,具有深邃的政治、经济和治理智慧,对于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条件下稳定国家财源、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防止农业生产人口流失和

贫富差距骤然加大、维护社会稳定等具有切实的作用,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规律的最质朴的证明,对于秦朝消灭六国、形成统一的国家起到了积极的、巨大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其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采取刻舟求剑的态度,这种只适用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和产业政策思想得到不断的强化和固化,其自身所具有的狭隘性得到不断放大,其中的合理因素因为没有与时俱进而变成了阻碍经济发展转型的落后意识,削弱了经济的活力,导致清中叶以后专制王朝的衰败,这也是今天值得我们加以警醒的。

国家的经济和产业政策不仅事关经济发展动力、发展水平和发展前景,而且事关国内民生、社会安全和国际安全、国际竞争力,存在着轻重缓急、本末长短等复杂的问题,必须统筹协调、因时制宜,否则,一旦畸轻畸重或者本末倒置,就会产生难以估量的损失和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对此,中国自然经济思想中的轻重思想、“成均”理论、平衡理念,具有极为重大的新时代价值。在巩固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发展成就的基础上,面对目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增加、经济发展前景黯淡的不利局面,我们必须以清醒的历史思维和冷峻的现实思维从黄河政治文明的重本抑末思想中汲取智慧、总结教训,破除本末固化、本末对立的僵化思维,制定科学合理而又富于适应性、创造性、实效性的经济与产业政策,有力地抵御经济发展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

一是既要树立总体经济观,又要注意优化经济结构,准确发挥重点行业、重点产业的带动和支撑作用。黄河政治文明的经济本末思想认识到了经济对于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作用,并认识到经济结构的重要性和经济政策的调节作用,对于我们今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把握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的主动权等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们要在经济发展和调整中抓住根本、兼顾细末、完善产业链和价值链,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制订“十

四五”规划时,既要做好“顶层设计”,也要“问计于民”,把握好本末关系。

二是创造性处理好经济发展的本末关系,既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和高端制造业,又协调性地发展高端服务业,多方面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经济是体系性的,越是现代化发展阶段,经济的体系性越强、所涉要素越多,不是简单的重本抑末思维所能统揽的。我们要超越重本抑末思想的狭隘性和落后性,围绕高质量的目标,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发展区域体系,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其中,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是根本。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发展环境和社会氛围。

三是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全方位激发不同经济形式的创造活力和全体人民的创富能力。经济是否有活力,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是否科学有效,经济体制机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关键。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深化经济体制机制改革,坚决破除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弊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大做优做强。要深化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体

制。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消费、投资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让发展活力竞相迸发、社会财富充分涌流。

四是在复杂不确定经济环境下,增强底线思维和风险对冲谋划能力,确保经济大局稳定和实现逆势增长。黄河政治文明的重本抑末思想揭示了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的阶段性特征,对于应对经济发展危局深具启发意义。2020年初骤然暴发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给本来就发展低迷的全球经济带来巨大挫伤,我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已经基本控制疫情,加快生产生活恢复,经济发展向好向稳的根本趋势没有改变,但是,这场疫情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完美收官带来严峻挑战。面对这种突发事件造成的空前严峻局面,除了坚持既定的经济发展战略,还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和创新思维,敢于和善于运用跨周期、逆周期调节的手段,在高瞻远瞩、总揽全局、科学谋划的基础上,用超常规决策和风险性决策对冲经济发展风险,因势利导地进行扩大内需与扩大外贸着重点的转换,增强经济发展抗风险的能力,以知难而进、逆水行舟的韧劲闯过难关、越过风险,并着眼未来蓄势、蓄能、蓄力。

七、破除传统义利观畸轻畸重甚至二元对立的偏颇思维,实现现代治理中道义引领与利益激励的相得益彰

义利观是关于人的生存发展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关系问题,是国家治理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和个人行为方式等人们必须面对的问题。黄河政治文明中蕴含有义利观的丰富内容和深刻精辟的见解,其中尤以儒家关于义利观的思想最为集中,并且在社会道德教化和实践中的影响更为深远。孔子、孟子、荀子都对义利问题进行了比较透彻的阐释,且其认识都比较辩证。一方面,他们认为

义是道的体现,是仁的要求,是礼的内在本质,是判定是非的重要标准,是国家治理举措正当性的基石;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利是人的正当合理需求,道不远人,正常的利益需求、正当的利益追求是人的本性,圣人也不例外,与道义并不相悖,崇高的义并不排斥合理的利。孔子对于追求和维护合理正当的个人利益持肯定的态度。他在《论语》中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他甚至明确地表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但是,儒家的义利观也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思想倾向,那就是推崇义的精神价值的崇高性甚至至上性,强调以义为先、以义为引领、以义为行为准则,要见利思义。正所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还把人们对义与利的态度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基本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义利观思想,但在重义轻利的倾向方面显得更加激进。他说:“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当义利冲突时,孟子主张把义放在首位,提出“舍生而取义”。在义利问题上,荀子继承了孔孟的思想,在其义利观中,荀子明确提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上重义,则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义是利的基本准则,利以义为准则则义利兼得;反之,则义利兼损。总体来看,黄河政治文明的义利观主要是先秦儒家的义利观,还是非常积极、昂扬、向善和公允、切实、合情的,既体现了人类崇高精神需求的本质和构建公序良俗的追求,又比较贴近人的正常情感和现实生活,在提升人的自我完善的精神境界的同时,也充满人性的温暖和共情,为有效的社会治理提供了易于施行的价值准则。孔子、孟子、荀子在义利问题上都强调重义轻利、以义制利,当义利发生矛盾时,积极主张舍利趋义乃至舍生取义,本来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有利于人们包括统治阶层的品德修养和精神境界提升,有利于培植社会良好

的道德风气,有利于缓解社会上不择手段的利益纷争。但是,孔子的“罕言利”、孟子的“何必曰利”、荀子的“重义轻利”和“羞利”思想倾向被以后的儒学大师不断强化甚至极化,从义利兼顾、以义制利、重义轻利发展到贬低、压抑甚至窒息人的正常正当的利益需求、利益追求和利益满足,在社会治理的原则和政策措施中不重视利益因素的考量,忽视甚至放弃对于实现和维护崇高的道德准则所做的奉献与牺牲行为的利益补偿与激励。如董仲舒提出:“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这一思想倾向发展到宋代则形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更加趋于极端化和反人性、反常理化,成为束缚人性的枷锁。这种“过度叙事”,其实就是一种“低级红”“高级黑”的行为。这种思想脉络和倾向看似高扬精神旗帜、崇尚道义和气节、勇于弘道卫道、倡导敢于舍弃现实的利益甚至生命,但植根于严格的等级、严酷的君主专制的政治社会土壤,这种严苛的义利观实质上约束的只是社会民众和下层群体,最高统治者、当权者和处于社会优越等级的群体则享有各种道德豁免权而不受约束。这种高调的义利观成为事实上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使人们对利益问题三缄其口,即使是正当利益也羞于启齿,在各种治理政策中也先天地缺少利益激励思维和相应措施,恶化了社会善良道德发扬光大的社会土壤,导致义与利的对立和道德与利益的相悖,抑制了社会经济利益的利益动力。同时,国家统治集团和社会上层由于其政治特权而凌驾于这种道德教条之上,侈谈心性、空谈道义而又行己无耻,造成整个社会道德的虚伪化。

黄河政治文明的义利观有着重要和永恒的思想价值,是我们党革命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牺牲精神的重要源头,在新时代国家治理中仍有其现实借鉴价值。相对于西方“经济人”假设的“利益最大化”理念,黄河政治文明中“重义轻利”“义以生利”的义利观更有利于解决稀缺资源与众多人的利己需要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亚当·斯密看来,“经济人”与“道德人”应当是一致的。因为从抽象人性过渡到市

场人性,如果只把人性归结为个人欲望、自私、任性,那么市场人性将会成为原始森林中的狼性。在他看来,人还有同情心的一面,即怜悯和同情弱者,从而进行慈善和救助。同情心原理实际上揭示了人的本性中有着关注他人的倾向。但是,用怜悯和同情来对抗资本的贪婪完全是徒劳的。因为市场竞争必然带来两极分化。即使怜悯和同情实现了良心发现和自我救赎,本质上还是利己。更加全面地看,市场经济的人性预设需要一种更高更健全的人性,有必要从怜悯和同情走向仁义主导的良知、良能。从抽象人性过渡到市场人性,不应当只取舍人类自私和欲望的向度,而应该建构一种既保持私人向度又保持社会化的健康人格,从市场人性进一步上升到社会人性,而黄河政治文明的义利观则明显有利于超越从“经济人”出发的狭窄视界,具有生命、生产、生活、生态的多重意义。但是,黄河政治文明的义利观本身所带有的以及历史衍变中所滋长的偏颇认识和极端因素也具有很大的消极影响,需要在现实的思想观念和治理政策层面加以矫正和剔除。

一是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继承和发扬黄河政治文明义利观的同时,立足于新时代的社会基础和认识深度、认识高度来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坚决矫正义与利脱节、义与利相悖的问题,防止义利观上的“低级红”和“高级黑”问题。义利是相互依存的,也是相互制约的,体现的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二者不可分割、不可偏废。从侧重性上讲,义体现的是合理的利益、整体的利益、正当的利益、合宜的利益以及这些利益所体现的人的尊严、社会文明的共同价值,而利体现的是个体的利益、直接的利益、欲望的利益、扩张的利益、非正当的利益甚至非法的利益,其载体都是利益。无论道义表现得多么崇高,为追求、实现和维护道义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包括公而忘私、见义勇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都不是为了付出而付出、为了牺牲而牺牲,而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一个更有价值、更加公正和更具根本性、长远性的利益,以及人和其所在共同体的精神追求与荣耀。为了道义所做出的奉献和牺牲,只有得到相应的利益或者更有价值的利益补偿,才是符

合道义原则的,也才能支持、支撑、激励更多的人来服从道义、尊崇道义、维护道义、追求道义,尽管其为道义而付出、奉献甚至牺牲并不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但是,如果在义利观上单纯地以个人利益牺牲的程度来评价道义崇高的程度,而不注重对个人利益牺牲者进行应有的利益保障、利益补偿、利益回报,那这种所谓的道义原则本身也是不符合道义的,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公众的心理期待的。正确的义利观必须体现惩恶扬善、激浊扬清的社会功能,绝对不能让尊崇道义、维护道义、追求道义的人利益受损,更不能让无视道义、践踏道义的人在利益上受益,这是一个最起码的道义原则。唯有坚持这样一种道义原则,我们的义利观才能具有感召力并发挥促进良好社会治理的作用。因此,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的义利观必须防止无视人民群众的合理利益、正当利益、合法利益的保障、补偿和激励,涵养社会尊崇道义的物质基础。否则,那种虚高的只讲付出、奉献、牺牲而不讲合情、合理、合法、合宜的利益回报的义利观,只能造成整个社会漠视道义甚至违背道义。

二是要将正确的义利观贯穿于国家治理的法律、政策、道德教化的各个环节,保持弘扬和维护崇高道义行为的法律保障、政策扶助、利益补偿和精神激励的一致性,有效化解义利选择上的社会冲突与心理冲突。正当的利益是善治的基础,崇高的道义是社会善治的灵魂。义利一致,社会治理就减少了内在的冲突与混乱,社会就容易自然地生成凝聚力和共生力;义利相悖,社会基础就会土崩瓦解,社会矛盾和问题就会治不胜治、防不胜防。正确的义利观需要践行,更需要维护和滋养,必须体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社会正义和普遍情感,法律、政策、文化宣传等社会治理载体和工具都应体现利益公正、道义崇高、义利相得益彰的要求。对于立法、司法、执法来说,必须重视和发挥扬善惩恶的作用,使法治底线与道义高线相衔接、相一致,以底线护高线,防止有关法治行为可能对道义产生的某种伤害;对政策制定和实施来说,要充分考量道义价值、体现道义价值、激发道义价值,尽可能

避免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义与利的冲突,要以义制利、以利彰义、义利兼顾,既体现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又体现政策后果对弘扬崇高道义价值的支持作用;从文化宣传工作来说,既要坚持崇尚道义的主旋律,又要注意避免脱离社会现实条件和人们合法合理合宜的利益需求,要有人情温暖和人性关怀,切忌人为拔高道义标准、有意掩盖和抑制人们正当的利益追求动机,以免造成义与利的分裂、道义标准的虚幻化。

三是立足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创新和完善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形成崇尚道义、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优良社会环境。物质生活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前提和基础,利益需求是人们最基础也是最根本的需求,道义追求必须植根于比较合理公正的利益需求与满足之上。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虽然包括物质生活需要与精神生活需要,而且精神生活需要的重要性不断凸显,但物质生活需要的基础性、前提性地位不能动摇,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在现代社会治理中体现和坚持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利益需求第一性的原则,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不断改善民生,通过不断创新完善民生政策尤其是构建公平公正合理的社会利益分配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规范隐性收入,遏止以权力、行政垄断等非市场因素获得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明显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并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职能,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让人民群众共创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奠定发扬光大正确义利观的坚实社会基础和利益基础。

四是按照党的先进性本色和领导干部的职责要求,在弘扬新时代义利观上形成以上带下、蔚然成风的良好态势。义与利尽管在总体上和根本上是统一的和相得益彰的,但这种统一是对立的统一。在一些特定的情形下和面对特定的问题时,为了实现道义、维护道义必须有人做更多的付出、承担更大的压力、克服更大的困难,甚至要牺牲自身、家庭、团体的利益乃至个人的生命。面对艰难的抉择与严峻的

考验,是党、国家、人民利益至上而知难而进、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还是患得患失、畏怯退避、推诿苟且,这是检验一个人、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是否具有正确义利观的试金石。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要培养和营造全社会崇尚道义的精神和风气,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发挥模范作用和表率作用,在道义上要有更自觉的行动、更高境界的表现,真正起到以上率下、身教重于言教的作用。更具体地说,在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尤其是义利矛盾问题时,对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着重通过重义轻利、以义制利、舍生取义的要求而使其努力做到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公私分明,具有“公共服务动机”;对普通群众则重在通过正当利益激励、不正当利益限制而使其见利思义,将道义引领与利益保障统筹推进,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行为准则。

八、不断深化新时代道与器的思想探索和实践创新,最大限度地发挥现代科学技术的治理作用

道与器思想是黄河政治文明至为深邃的思想资源,在认识与实践、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及其相互关系上做出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黄河政治文明具有强烈的尊道、求道、殉道精神,充盈着追求真理、止于至善、昂扬奋发、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是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不屈不挠、愈挫愈强、坚韧不拔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核心密码,是我们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必须继承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所谓道,简言之,就是太极,就是规律,就是原理,就是价值体系,就是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思维规律和道义准则的最高体现、最终形态。道不是孤立存在的,是附着于各种物质形态之上的,道与器浑然一体、密不可分。但黄河政治文明的道与器关系呈现出一种以道为尊、以器为卑直至道与器分离的思想倾向,使道越来越玄妙化,与器背道而驰。老子和庄子把不可知论引入道论,“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成为判定道的标准,到魏晋时期则发展成系统的玄学,坐而论道成为士大夫和知识阶层的时尚,道显得更加虚无缥缈。其后,此种道学与玄学又与已经传入的佛教禅学合流,推崇顿悟,道与器基本被分割。宋明理学和心学

沿着这种思想旨趣和思维路径不断强化和理论化,使黄河政治文明中道与器思想的辩证性渐趋窒息,在极端地推崇精神力量、思想力量、意志力量的同时,也把这精神力量、思想力量、意志力量变成了无所归依的孤魂,从而使黄河文明在宋代产生了严重的内向化、内卷化问题。这种极端的思想倾向与模式造成了黄河政治文明在历史实践中注重心性修养、注重道义教化而忽视制度创新、抑制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后果,这也是我们这个泱泱文明大国没能及时进行近代文明转型而衰落的重要思想根源。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借鉴道与器思想的得失,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必须重视价值引领与制度创新的同步推进,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和必经阶段,其中,价值理念的现代化是灵魂、是道,制度体系的现代化保障是器。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科学、民主、法治,是价值理念和制度体系的有机统一,党的领导理念和领导制度体系的现代化是我国顺利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根本保证。当前,党的领导理念的现代化已经形成广泛共识,深入人心、民心,但在现代化制度体系的设计和 implementation 方面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存在重道轻器、道有余而器不足的突出问题。要借鉴我国新时代经济建设供给侧改革的思路与经验,深化党执政的制度变革进程,增强制度供给意识,提高制度建设水平,把科学、民主、法治理念深化到制度体系之中,铸造执政、治理的制度重器,切实把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现代治理效能。人类有很多创造发明,但最重要的发明是制度,因为它不仅解决了人类征服自然的问题,而且解决了如何驾驭人类自身的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定型程度,取决于制度的优越性能否充分展现。法律是最重要的制度形式,也是制度的最高形态。把法律这套规则体系转化成治理效能,需要依靠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随着人民对包括法治在内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断增长,随着国内外发展环境和形势的日益复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我们必须系统总结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色和显著优势,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能力,继续完善和发展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优越性,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二是必须反思价值理性脱离工具理性的思维偏误,坚决清除忽视科学、拙于技术的思想阻碍,大力发展前沿性、基础性、战略性科学技术。要深刻反思和清理黄河政治文明中重视义理、轻视科技的陈腐观念,摆正道与器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深刻地领会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深刻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不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就不能掌握科技发展主动权,就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在新时代的大国竞争中,中国技术与美国技术、德国技术、日本技术的争夺将是长期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对于我国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大国崛起、民族复兴、民生保障、国防安全乃至制度和意识形态竞争具有决定性意义,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才能以国之重器捍卫中华文明之道。因此,要增强道器合一、以器卫道意识,从国家发展需要出发,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

三是高度重视现代技术成就对于社会治理的价值,大力推进现代治理的智能化、高效化。现代社会治理要素众多,社会问题复杂,国内外各种矛盾交织。尽管我们已经初步确立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也得到不断提升。但总体而言,很多方面还停留在文件要求和思想认识层面。要实现有效治理目标,必须重视和善于发挥科技赋能的作用,把传统社会治理人人参与的人海战术与现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紧密衔接,以技术能力增强和保障政治动员能力、组织协调能

力、社会自助能力、群众参与能力。

四是重视从思想根源上消除领导干部中华而不实、坐而论道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作风,形成以器弘道的优良政风。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是党的领导、社会治理的核心力量,其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直接关系到党的领导形象和社会治理效能。从道与器的视角来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政治过硬必须由本领高强来支撑,高素质干部必须体现在高水平的专业素养和能力上。但从现实中看,不少领导干部还残留有传统士大夫坐而论道、纸上谈兵的顽疾,喜欢谈战略,热衷于做规划,对远景豪情满怀、雄心勃勃,对现实问题尤其是现实难题却束手无策、有意回避、推诿扯皮、转嫁责任。基层和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既是一些领导干部思想意识不良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些领导干部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为防止现代治理目标落空,铸造优良干部作风,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就是要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强化领导工作的问题导向,以正视问题的态度、敏锐发现问题的意识、敢于面对问题的担当、善于解决问题的本领来识别干部、评价干部、选拔干部,树立培养和重用德才兼备、道与器有机统一的“硬核”干部的正确用人导向。

九、发扬黄河政治文明中关于美好社会图景以及礼乐之治、礼法之治的天才想象力,构建开放、和谐、既井然有序又充满活力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黄河政治文明是一个具有远大抱负、对美好社会和美好生活具有天才想象力和行动智慧的文明,是中华民族雄健豪迈、睿智温雅、热爱生活、重视人伦、富于情调、崇尚美善、勇敢坚韧等文明气质的源头。黄河政治文明的奠基者和先驱们对美好社会图景进行过天才的想象与设计,如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其乐融融、各得其所的大同社会,安居乐业、谨守礼法、尊卑有序、家给人足、惩恶扬善的小康社会。孟子还对这种美好社会生活形态做出了诗情画意般的描绘:“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

足以无饥矣。”当然,实现这种田园诗一般的美好生活目标,必须具备一个政治前提,那就是君仁、君义、君正,实行仁政,与民同乐、与民同忧,坚决摒除暴政、苛政。同时,他们在治理方式上还提出了充满美学意蕴的礼乐之治,讲求政令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纹),像音乐那样美妙动听、动人心弦、和符中节,具有与生俱来的政治美学和治理美学气质。所有这些关于美好社会和美好生活的想象、描绘、设计和实践追求,充分反映了黄河政治文明的美好情怀、生活智慧、心理追求,具有普遍的、共同的思想价值。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法国、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中汲取深刻的思想养料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一样,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应该自觉地从黄河政治文明关于美好社会的想象、设计、描绘和实践路径中寻求灵感、科学谋划,并在新的历史阶段将其变为现实。在新时代,要通过“治理起来”,实现“组织起来”与“活跃起来”的统一。

一是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政治、发展、治理的终极目的,促进治理现代化与人本化的有机统一。黄河政治文明重视民众、民生、人伦、人情,这与党的宗旨和新时代党的全部工作目标天然契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着眼于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就。把民众放在国本的地位,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政治和治理的最大道义,是获得人民认同和支持的先决性条件,是黄河政治文明的思想精髓。“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我们要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切实让人民感受到社会发展、治理水平提升的成效。

二是把为了人民与依靠人民紧密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形成治理的社会共识和合力。黄河政治文明的治理理念尽管也强调民众的地位、民生的重要性,但往往把民众对象化、民生虚置化,往往难以得

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和阻碍因素。我们要以史为鉴,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以构建科学完善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为基础,树立大社会观、大治理观,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同政府的资源整合优势、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社会组织的群众动员优势、网络媒介的个体参与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打造全民参与的开放治理体系,以保障人民的利益,激发人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以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提高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三是把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领导工作的敏感点、着重点、立足点,厚植社会治理的民心民意基础。孟子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民生的小事是政治和治理的大事,这是进行政治领导和社会治理必须把握和遵循的辩证法。人民群众最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党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就要针对这些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真操心、出实力,统筹做好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各项工作,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四是汲取传统政治美学智慧,促进新时代国家治理理念深入人心、务实高效。我国进入新时代,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矛盾多元、多样、多发。这就要求,一方面,必须构建法治保障、民主协商、尊重权利、体现公正的现代治理体系与格局,既要完善社会矛盾排查预警机制和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又要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积极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联动,推动诉讼与非诉讼方式有机衔接,建立规范完善的公众参与规则程序,善于引导群众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提高矛盾纠纷化解的整体效果和效力;另一方面,要善

于借鉴黄河政治文明的美学治理智慧,发掘、提炼和转化礼乐之治的现代治理价值。治理模式的选择离不开人性的假设,但人性本身是十分复杂的。西方是假定“人性恶”,走的是一条“法治化”的道路。而黄河政治文明思想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性,有“人性善”“人性恶”“人性无善无恶”等许多看法,但主流认识是始终执着于“人性善”来构建治理体系。秦朝完全以“人性恶”为理论依据厉行法治,虽然在一定时期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以武力统一六国,建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君主专制王朝,但其“以恶制恶”“以刑去刑”“以暴制暴”的极端法治化治理,也导致这个强大的王朝仅仅存在十几年就骤然灭亡,这也说明“人性恶”假设的片面性,以及单一地采取法治模式的局限性。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除了坚定不移地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还应丰富治理的多元化思维,探索法治、德治、自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径,将“人性善”和礼乐之治的治理美学思维纳入现代治理实践,吸收黄河政治文明中重视伦常、与人为善、推己及人、礼让为先、宽以待人、和气生财等价值元素,将天理、国法、人情有机融合,减少利益矛盾上斤斤计较的薄气、对簿公堂的戾气,将法治的秩序与人性的美善、人情的温暖结合起来,将井然有序和充满活力统一起来,将德治、法治、自治贯通起来,构建“德上法下”的社会治理方式,构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超越性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十、深刻总结黄河政治文明中王霸思想的经验与教训,在应对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充分展现中国智慧、做出中国贡献

所谓王道思想,主要是指由儒家提出的尊崇周天子的地位、维护西周所创立的礼乐之政和分封体系、以德治和仁政为依托处理国内尤其是国家间关系的政治主张,其本质要求是处理国家间关系要尊道义、讲礼仪,不能逞强倚势、阴谋诡诈、不择手段地欺凌他国、损害他国利益,更不能为了本国利益侵略、蚕食甚至吞灭其他国家;否则,不仅违反天道,还必然遭受天谴。所谓霸道,是指为了实现自己国家的利益和战略图谋,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内强国力,外用诈谋,纵横捭阖,不惜采用军事手段攻城略地、灭国征伐,唯利是图,完全不受任何道义和规则的约束。王道与霸道的区别主要在于处理国家间关系、追求和实现自身的国家战略讲不讲道义和手段。孟子认为,王道就是以仁义服人,霸道就是以实力服人。他说过:“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荀子对王道与霸道也有过系统的论述,他所认为的王道除了尊崇仁义,还必须以强大的国家实力作为支撑,以完善的法制和有效的国家治理作为保证。他认为,讲礼义者称王天下,此为王道;讲信用者称霸诸侯,此为霸道;讲阴谋权术者自取灭亡,此为亡国之道。也就是说,即使行使霸道,也要遵循最低线的规则,比如信用;否则,肆无忌惮,必遭灭亡。总体而言,儒家思想是尊崇王道、排斥和贬低霸道的。孟子认为,春秋五霸全是“三王之罪人”,荀子认为,五霸“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所以说“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霸)”。黄河政治文明从氏族到部落,到邦国文明,再到大一统的分封制国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的发展历程,文化融合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兼并直至统一,尤其是从春秋战国到秦朝的统一,长达五百多年,其间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群雄逐鹿,各诸侯国在处理相互之间关系方面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深刻的历史教训,其中的王霸思想及其王霸历史过程对于今天处理好复杂的国际关系、应对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仍有诸多有益的启示。

一是坚守道义制高点,坚持不称霸的根本战略,坚决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道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衡量指标和精神动力,是处理国际关系必须遵循的根本规则。任何违反和践踏道义的野蛮国家行为,即使能够在特定时期或短期内达到国家扩张的目的,也会由于违背了人的本性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趋势而最终招致可耻的、凄惨的失败。这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逻辑,也是黄河政治文明的进化史和世界历史的演化史所反复证明的。从这种意

义上说,黄河政治文明所揭示的王霸之辩的命题,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其对于王霸之辩命题的解答,今天仍是正确答案,那就是尊王道、弃霸道。不称霸,不仅是维护国际道义的要求,而且从历史经验和现实考量来说,称霸都是一种得不偿失、事与愿违的行为,最不符合经济原则。从我国春秋五霸来说,《荀子·王霸》所列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虽然曾经整兵经武、挟势用诈、耀武扬威,但结局都很惨,可谓取虚名而招实祸。比如,齐桓公高举“尊王攘夷”的道义大旗,号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可谓风光一时,赢得生前身后名,但“桓公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其后,齐国内乱不已,国势日衰,直至“田氏买齐”,姜氏齐国灰飞烟灭,曾经不可一世的称霸传奇变成了为他姓火中取栗的笑料。晋文公的称霸尽管可谓名利双收、生荣死哀,但由于称霸需求衍生固化了权臣统兵制度,晋国王室控制力衰减,最后导致韩、赵、魏三家分晋。楚庄王可畏意气风发,曾经问鼎中原,所向无敌,却在争霸过程中埋下了逞强斗狠、不重道义、国大无政的不良政治基因,此后楚国政治混乱、楚才晋用,最后在战国纷争中为秦国所灭。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尽管也都雄心勃勃地到中原争霸,在满足了一时的虚名后,两个曾经强盛一时的国家迅速败亡,甚至都没有熬到战国时代,仅仅留下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历史教训。从最近的世界史来说,德、意、日法西斯企图称霸世界,最后都遭受惨重失败。苏联热衷于与美国争霸,导致国内经济社会结构失衡和战略严重透支,最终诱致国家解体。现在美国仍醉心于称霸世界,死抱着“美国优先”的霸凌准则,带头违反由其倡导的联合国多边体系,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和地区事务,企图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也出现了不可控遏的大国衰落趋势。黄河文明重视王道,不走霸道之路,这与西方文化强调的“丛林法则”不同,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国强必霸”之路。黄河政治文明关于王霸之辩的经验教训以及世界现代史的进程都雄辩地证明,道义是永恒的,强力是暂时的,霸权不可取,文明和平发展是人

心所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主权国家独立成为普遍的事实和共同的道义准则,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世界发展的历史大势,如果再企图运用经济实力和军事强力对他国进行干预、压制、奴役甚至侵略、占领,不仅是人神共愤的不道义行为,也是经济和军事实力所做不到的,是一种极其过时的愚蠢的行为。黄河政治文明的王霸之辩与西方的“国强必霸”的逻辑是不同的,这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丛林法则”的区别。从竞争结果的“零和”到共生共赢的“和合”,充分体现了人类追求历史进步的法则。在新时代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积极发展自己,积极履行与国家实力和地位相应的大国责任,积极参与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新的国际秩序的构建,不搞野蛮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赢的文明交往规则,摒弃“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坚持“和为贵”“和而不同”,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的实现。

二是创造性地运用王霸思想的历史智慧,在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上增强国际影响力。王道思想尚仁、尚义、尚德,霸道思想尚力、尚利、尚谋,黄河政治文明的王霸思想主要是尊王道贬霸道,甚至将二者截然对立,单一尊崇王道,强调王者无敌,忽略了国家财力、实力、武力、战略谋划力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道义的支撑作用,忘记了无道无以立国、无力无以强国、无霸无以守国的浅显道理和常识性认识,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甚至会做出误国丧国的治国政策。在这方面,北宋重文轻武,溺于崇天理制人欲,醉心于王道自负,忽视了霸道自强,尽管经济繁荣、文化兴盛,但一直被北方草原民族压制凌辱,导致最后被金朝攻陷首都、掳走徽宗和钦宗两位皇帝的悲惨命运,这就是一个值得永远记取的教训。今天,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点上来全面辩证地看待王道与霸道问题,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王道和霸道都是一种治国理政尤其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必要手段,王道是统领

性的价值观,霸道是实现王道的基本条件和方略,二者尽管有主次和偏重之分,但不可人为分割。国家治理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应该文武并用、刚柔相济,若是没有强大的实力作为保证,所谓道义就无从推行;反之,如果放弃道义追求,唯利是图,恃强凌弱,必然四面树敌、众叛亲离、土崩瓦解、分崩离析。在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时代,一方面,我国必须义无反顾地遵从国际道义,坚定地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全力以赴地推进现代化建设,坚定不移地做世界和平的维护者、世界经济贡献者、世界重大责任的担当者、世界公正合理秩序构建的参与者,致力于建设持续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谐美丽的世界;另一方面,要优化经济结构,完善产业布局,加快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尽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时树立国家总体安全观,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加快实施新时代强军战略,打造卫国重器,以强大的军事实力维护国家领土安全、震慑分裂势力、实现国家统一,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企图遏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军事压制和挑衅行为,实现王道与富强的统一。

三是既重视长期战略规划与布局,又注意防止战略透支。绳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负大舟。王道与霸道的运用必须因势利导,或交替使用,或同时并用,不能执于一端。大国的崛起和竞争不是静态的实力对比和较量,而是复杂战略的谋划与博弈。在王道与霸道的实施上,我们既要做好战略谋划、战略规划,又要清醒地审视自身战略实力和战略能力,努力实现最大的战略效益。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既要高瞻远瞩,增强国际视野,谋划并有效实施全球战略布局,又要坚持底线思维,站稳脚跟,韬光养晦,重视“留余”智慧,防止战略透支,避免陷入战略沼泽地而难以自拔。

四是灵活运用合纵与连横策略,增强大国竞争中的战略韧性与防渗透能力。主要发端于战国时期

群雄逐鹿的合纵连横战略,对于当今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扩大国际生存空间、加强国际合作、增强国际信任、分化针对我国的围堵同盟、防范战略渗透、增强国家战略韧性等都深具启发意义。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剔除其中朝秦暮楚、见利忘义、不择手段等的历史性恶劣因素,重视谋略而不行诡诈,注重战略实效而坚守信义,纵横捭阖而遵从规则,正确把握政略、战略和策略,在风云变幻的复杂国际局势中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

历史地分析和现实地审视,黄河政治文明一直奔涌在中华文明的血脉中,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讲:“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黄河文明重视“共同体”的力量,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质基因,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与源于“市民社会”、强调个人权利和重视个体力量的西方近现代政治文化相比,黄河政治文明的治理思维和方略在应对重大危机,组织、动员、依靠、发挥集体的力量,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利益,追求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等方面具有更强的感召力和显著的治理绩效优势,这也是为世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客观需要。天人合一、大一统、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及礼乐文化、德法双治、文武双全之道,特别是临难不避、愈挫愈勇、向上向前、生生不息的性格禀赋,构成了黄河政治文明的精神特质。在新时代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中,不断深化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自觉地汲取黄河政治文明的治理智慧,在新的时代高度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发挥黄河政治文明的历史灵性,以黄河政治文明的复兴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简介:李庚香,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法学博士。

(摘自《领导科学》2020·9月(上))